



日僧圆尔辩圆的入宋求法 及其对日本禅宗的贡献与影响

法 缘

圆尔辩圆(1202—1280),俗姓平,日本骏河(今静冈县)人。日本临济宗著名禅僧、京都东福寺开山祖师。曾于嘉祜元年(1235)入宋求法,回国后对日本佛教及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日本佛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对于这位在日本佛教史上有名的禅师,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国内外对于他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学者们似乎比较热衷于对荣西(1141—1215)和道元(1200—1253)等禅师的研究。为什么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不多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圆尔辩圆所传的是兼修禅,已经不是宋朝本来的禅宗,所以也没能给予他在日本佛教史上应有的地位^[1]。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即拟就圆尔辩圆对日本佛教文化的贡献与影响作一探讨,目的在于说明圆尔辩圆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乃至佛教与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本文还欲说明圆尔辩圆入宋求法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有着长期

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交往,始于公元1世纪东汉光武帝在位时期,而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公元6世纪左右就展开了。到了中国唐朝的时候,日本从舒明天皇二年(63)至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先后向唐朝派出遣唐使达十六次之多^[2],可谓是达到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高峰。之后,由于中国唐朝末期至五代,战乱纷纷,日本废止了遣唐使,两国之间虽没有正式的官方使臣往来,但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中日两国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仍没有中断。

直到南宋时期,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由僧人主导,在非官方、非正式的交往下,继唐朝之后再次达到高峰。南宋时期,中国禅宗盛行,大量日僧入宋于中国江浙一带参访名师,学佛参禅。同时中国也有一些高僧应邀赴日弘法,以这些僧侣为桥梁,中日两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共同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热潮。圆尔辩圆就是南宋时期到中国求法的日僧之一。他于嘉祜元年(1235)入宋求法,在中国江浙

一带遍参名师,最后入杭州径山寺参临济宗杨岐派高僧无准师范(1178—1249),终得印可,嗣其禅法。

圆尔辩圆在宋六年,于宋淳佑元年(1241)回国,之后在日本佛教界一直都非常的活跃。不仅历任日本当时各名川大刹的住持,还赢得了朝野当权者、公卿贵族、广大僧俗的拥护和信赖,纷纷皈依其门下。圆尔辩圆及其弟子们以东福寺为中心,首先将临济宗杨岐派传入日本并加以倡导,成为日本临济宗杨岐派的始祖,继荣西之后,促进了临济宗在日本的确立。除了传禅之外,圆尔辩圆还被称为“日本宋学传入的第一人”^[3],在日本积极传播宋学。他将宋朝的茶及茶礼、诗文、书法、绘画、寺院建筑、碾茶以及面粉、面条的制作方法等传入日本。他对宋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得宋代先进灿烂的思想文化,成为后世日本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为后世日本五山文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圆尔辩圆对日本佛教及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贡献,他在日本宗教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因此,他在日本禅宗发展史乃至佛教、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一、南宋求法日僧与江浙佛教丛林

南宋时,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大量的日僧乘商船之便入宋,犹如一股潮水。那么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入宋?他们入宋的目的是什么?入宋之后他们又是去哪些地方,在哪些场所活动呢?圆尔辩圆和他们入宋的目的以及活动的场所相同吗?下面将探讨这些问题。

1、日僧入宋求法的目的

中国的宋代,包括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立国三百二十年。北宋建都开封,后来受到辽金异族的侵入和攻击,被迫南迁,以当时的临安(今杭州)为都城,建立了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政权。中国的北宋,大抵相当于日本平安朝的藤原氏全盛时期,南宋则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

在中国北宋时代,日本的对外贸易相对于前朝来说,似乎有衰退的倾向,因为当时的日本采取了禁止本国私人私自到海外去等锁国政策,因此在海上往来的

商船只是宋船而已。所以可以说在北宋的时候,中日的对外贸易是以中方单方面的而已。尽管如此,此时中日的佛教文化交流仍然在持续,仍然有日本僧人随宋商船来中国,只是为数不多。这个时候入宋僧名留史册的只有:裔然、成算、寂照、念救、绍良、成寻、赖源等二十几位僧人。^[4]

但是到了南宋,中日之间的交往就变得频繁了起来。中国的南宋虽偏安江南,但很注重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和交通,因此对外贸易比北宋更为兴盛,经济上也更为繁荣和发达。此时的日本方面,政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藤原氏被武士阶级所取代,因此日本武士阶级开始掌控政权。第一位执权的日本武士是平清盛(1118—1181),他非常支持和奖励日宋的贸易,在他任政的时候积极发展日宋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解除了日商不准出国贸易的禁令,为了促进日宋贸易,他还在摄津的福原修建别墅,修筑兵库府,开通音户的濑户,从此宋商船可以直接进入濑户内海停靠兵库港,而不仅只限于太宰府一地。他对宋商还特别优待,让他们去福原别墅,特别邀请后白河法皇(1053—1129)濒临,这都是想要繁荣和扩大对宋的贸易。

在平清氏之后执政的源赖氏(1147—1199),和平氏一样,都热衷于对宋贸易,于是日宋之间商船的往来日益频繁起来。这也给两国僧人之间的往来提供了便利,僧侣可以随船往来于日宋之间,因此随着日宋之间商船往来的频繁,中日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在以僧人为主导下,开始走向继唐朝之后的第二次高峰。在这一时期有中国应邀去日本弘法的如兰溪道隆(1213—1278)、兀庵普宁(1199—1276)、大休正念等20多名中国僧人^[5]。但更多的是,这一时期大量的日僧入宋,据木宫泰彦先生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中的“南宋时代的入宋僧一览表”所记载,当时入宋的日僧达109人^[6],而且他们之中有的竟来回达二、三次的,如重源、荣西和净业(1187—1259)等僧人。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南宋时候有这么多的僧人不顾冒鲸波之险热衷于入宋呢?他们入宋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应该说南宋时候的入宋日僧,他们应该不同于北

宋如耆然、寂照、成寻等人入宋,只停留在对中国的佛教圣地如五台山、普陀山、天台山等名胜古迹的朝拜,以寻求达到灭罪和解脱的程度上^[7]。南宋时的入宋日僧,他们大批入宋主要是为了求法而来,而且多数是为了求禅法而来。

因为在中国南宋的时候禅宗特别的盛行,正如铃木大拙先生所说,中国禅宗“发达于唐代而繁荣于宋代”^[8]。的确中国禅宗,历经五代、北宋以后却日益昌盛起来,到了南宋已达到烂熟的时期,禅宗在南宋成为佛教的主流,并几乎成了佛教的代名词。因此禅宗便成为入宋日僧学习的首选目标,这乃是当时必然的趋势。圆尔辩圆的入宋,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求禅法,如《怪一国师年谱》中说:“某甲(圆尔辩圆)猥承慈接,亲闻显密二宗,不为无得,是故已登传灯大阿闍梨位,然教外宗旨未颁厥旨,此夙缘稍差尔,愿欲往宋,访寻知识。”^[9]

圆尔辩圆于嘉祐元年(1235)入宋求法,遍参知识,最终得法于临济宗杨岐派无准师范门下。像圆尔辩圆这样为了入宋求禅法的日僧非常之多,如道元、法心、神子荣尊、祖元、湛慧等就都是为了学习禅宗入宋的,如此一类的日僧占了南宋时期入宋求法的绝大部分^[10]。

当然大批日僧为了学禅而入宋求法,但也有一小部分是为了传习律宗而入宋的日僧。日本的律宗自唐代鉴真传入,曾盛极一时。但到了平安时期则呈现衰落,戒律教仪几乎荒废,甚至这个宗派都几乎要失传了。为了振兴律仪,有的日僧便入宋学习戒律,如俊苾(1187—1259)“以大小律范,未尽其要,须入中华抉择所疑”^[11],而携弟子安秀、长贺入宋从明州(今宁波)景福寺如庵乃至温州广德律师习律,于嘉定四年(1211)携同经律章疏两千余卷,回国于京都开创泉涌寺,大弘律宗。法忍净业曾两度入宋习律,之后于京都创戒光寺,和泉涌寺并称为二大律刹,教化甚光^[12]。之后他们的弟子及西大寺成愿觉如、东大寺戒坛院之真照、禅心等相继入宋^[13],目的也在于访问戒德,寻求律籍,回国传习戒律。不过为习律而入宋的日僧在当时不多。

日僧入宋除了是为学习佛教的禅宗、戒律之外,事实上他们似乎还有兼习南宋繁荣、发达的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以文化来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在南宋时期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宋明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经张载、程颢、程颐到南宋朱熹而集大成,故又称朱程理学,日本将之称为宋学。宋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本土哲学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了又一高峰。铃木大拙则认为“宋学是中国人心理的精华”^[14]。这种新儒学与以往旧儒学相比,重点已不放在形而上的繁琐的训诂诠释上,而是着重探讨心性与宇宙的关系、论证理气、性德等问题。因此吸收了大量佛教华严宗、禅宗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论及万物化生论,将儒家思想哲学化,因而与禅宗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之处,所以宋代中国很多禅僧大多兼习禅儒,如契嵩(1007—1072)、大慧宗杲(1089—1163)及其法脉的虎丘禅系痴绝道冲(1169—1250)、无准师范等人都有很深的儒学修养,他们都主张佛儒并重^[15],因此在传播禅宗的时候,也往往不忘传播当时流行的宋学,因此使得宋学在这一时期其势力更加如日中天,非常之兴盛。入宋求法的日僧自然也受到宋学的熏陶,他们在学禅之余,也兼学宋学。这正如铃木大拙所说的:“为了学禅而前往中国的日本僧也是如此,他们的行囊,除了禅典之外,全被儒道两教的书籍所填满。”^[16]很形象的说明了当时日僧入宋既学禅又学宋学的现象。

除了学习宋学之外,南宋的诗文、书法、绘画、建筑等各个方面也有兼学,他们似乎是效法遣唐使大规模吸收唐代文化那样,也将璀璨的宋文化全面移植回日本,圆尔辩圆就是这样的日僧。他几乎是全面的学习宋文化,所以回国后不仅传播禅宗,还传播宋学,并将宋朝的茶及茶礼、诗文、书法、绘画、寺院的建筑、碾茶以及面粉、面条的制作等也传入了日本,对日本的佛教及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日僧入宋求法的场所

南宋时期大量日僧入宋,他们所到的地方主要是以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这是因为江北广大领土都被金人所占领,因此这些日僧不能北上去五台山、洛阳、长安等名刹参访。另外从地理位置上来

说,江南地区是日宋往来贸易的主要场所,特别是明州、台州、杭州属于中日交通之门户,日僧入宋多半是在这些地方登陆,尤其是明州,素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如果从日本的博多或者平户港出发,横渡中国海,就可以直接到达南宋的明州,这之间所需的时间只有十来天,在当时来说这是一条从日本到中国最简便和快速的捷径,耗时最少。因此当时很多日僧就是通过这条路线到达宋地。圆尔辩圆就是如此,在《荣尊和尚年谱》中就说:“师(荣尊者)岁四十一,与辩圆相共商船,出平户,经十昼夜,直到大宋明州。”^[117]而且从明州到杭州、台州等江南其它地方路途都不是很遥远,更何况当时江南的名刹也较多集中在明州、杭州等地,所以入宋之日僧多就近在以明州和杭州等中日交通之门户为中心的江南丛林参访名师。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大部分入宋日僧目的都是为了学习禅宗,而禅宗名刹几乎也都在江南地区。

中国宋代诸帝王除了宋徽宗曾一度崇信道教之外,其余诸帝大多皆崇信佛教。宋室南渡后,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江南的寺院在宋朝政府的大力扶植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南宋末年吴自牧所著《梦粱录》所记载,南宋时期仅杭州一地大小的寺院就多达四百八十余所^[118],因此杭州有所谓“东南佛国”之称,寺院非常的兴盛。当时江南地方的很多寺院在继吴越王钱镠皈依禅宗之后,多改为禅寺。经北宋而至南宋,江南禅寺特别兴盛。到了南宋宁宗的时候,经卫王史弥远(1164—1233)的奏请,将江南的禅寺规定等级,建立了所谓“五山十刹”制^[119],以五山位在所有禅院之上,十刹之寺格次于五山。此制是依据封建社会官僚等级和晋升制度建立起来的官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把官寺分为五山、十刹、诸山(甲刹)三个等级。禅僧要经历从诸山甲刹至十刹的较低的等级之后,才能到五山担任住持。

据此,当时禅院的五山是:

- 第一、径山 临安府 径山兴圣万寿寺
- 第二、灵隐 临安府 景德灵隐禅寺

第三、天童 明州 太白山景德禅寺

第四、净慈 临安府 报恩光孝禅寺

第五、育王 明州 育王山广利禅寺

十刹是:

第一、中竺 临安府 天宁万寿永祚禅寺

第二、道场 湖州(浙江湖州)乌程县 护圣万岁禅寺

第三、将山 建康(南京)上元县 太平兴国禅寺(后改名为灵古寺)

第四、万寿 平江府(苏州)报恩光孝禅寺

第五、雪窦 明州 资圣禅寺

第六、江心 瑞安府(浙江温州)永嘉县 龙翔禅寺

第七、雪峰 福州(福建福州)侯官县 崇圣寺

第八、双林 婺州(浙江金华)金华县 宝林禅寺

第九、虎丘 平江府 云岩禅寺

第十、国清 台州(浙江台州)天台县 教忠禅寺^[120]

相传此五山十刹,乃仿效印度释迦在世时所住过的鹿苑、祇园、竹林、大林、那烂陀等五精舍,以及释迦示现入灭的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锡塔、瓶塔、盥塔等十塔而列定的。

宋代的禅院五山十刹,享有免税等特权,其住持由官方派任,寺院的建筑雄伟,规模宏大。除了禅宗的五山十刹之外,江南还有教院的五山十刹:临安府的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瑞安府的能仁寺、明州的白莲教寺等,称为教院五山。而临安府的集庆、演福、普福,湖州的慈感,明州的宝陀,绍兴府的湖心,平江府的大善、北寺,松江府(明州鄞县)的延庆,建康府的瓦棺,称为教院十刹^[121]。

这一时期的入宋僧,凡属于入宋学习戒律的,多访问于教院的五山十刹,如俊苾就曾去临安府的下天竺参访过^[122],其弟子闻阳湛海曾在明州的白莲教寺寄居多年^[123]。而凡是为了学习禅宗而入宋的,都寻访禅院的五山十刹,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所居。在当时虽说有禅院或教院的五山十刹,但入宋僧所到的也只是处于中日交通门户的明州及台州、杭州等地的寺院参访,距离稍远的瑞安府、福州、苏州和南京等地的寺院,去的人还是较少^[124]。

在禅院的五山十刹中,求法日僧去的比较多的是位于明州的育王山广利禅寺和天童太白山景德禅寺,以及位于杭州的景德灵隐禅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又名南山

净慈寺)、西湖上、中、下三天竺,还有位于浙江省天台县的天台教忠禅寺。如荣西、道元、圆尔辨圆、樵谷惟仙、约翁德俭、无关普门、无象静照、南浦绍明、彻通义介大多数都曾游历参访过这些寺院^[29]。

但在禅院的五山十刹中,入宋日僧前往参访最多的是位居五山之首的径山兴圣万寿寺,中国人习惯称为“径山寺”。此寺与日本禅宗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日本人称其为“万寿寺”。当时前往径山参学的日僧非常多,如圆尔辨圆、神子荣尊、性才法心、随乘湛慧、妙见道祐、悟空敬念、一翁院豪、觉琳等都曾入居径山,继承了无准师范的法统^[29]。前往径山求法的日僧络绎不绝,就整个宋代来说,到径山求法的日僧也是创纪录的,以致于无准师范门下的高足无学祖元(1225—1286)在赴日本传禅时曾说:“老僧虽在唐朝,与日本兄弟同住者多。”^[27]可以想象,当时在无准师范门下的日僧之多。乃至到了无准师范之后的元、明两朝,前往径山求法的日僧也从未有间断过^[28],因此可见径山与日本禅宗的密切关系,它可以说是日本禅宗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对日本禅宗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圆尔辨圆之入宋求法

正是基于和大多数入宋日僧一样的目的,为了学习禅宗而入宋,圆尔辨圆于宋嘉祐元年(1235)入宋求法,于中国江浙一带遍访名师。

1、遍访名师

圆尔辨圆天资独厚,聪辩过人,五岁的时候就投久能山尧辩之室,学习《俱舍》。十二岁学习天台之教,十五岁列席天台止观讲义,当讲师讲到“故四谛外,别立法性”处,一时困窘,语无伦次,这时十五岁的圆尔辨圆走到前面,道出了完整的解释,语惊四座^[29]。十八岁时,在三井的圆城寺(位于滋贺县)落发,专心研习天台教学。后来又赴南都奈良东大寺登坛受戒,后又到京都学习儒家等外学典籍。他当时可谓是深究教内外之理,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僧人。但他好象并不满足于这些,认为所学的这些教内外典籍于生死毫不相干,只如尘沙,没有真正的价值,如《径一国师年谱》中说:“一日自思,以我比年学大小乘,究权实教,但增知

解而已,于生死大事,何益之有?吾闻野州长乐寺,有荣朝者,非畜传持三部密法,而也受禅戒,听教外别传之道,知识非遥,何滞此邪?”^[30]

于是离开三井圆城寺,前往上野(今群馬县)长乐寺荣西禅师的高徒荣朝禅师处,随荣朝参究禅法。继而又辞别荣朝,入宋求法。

圆尔辨圆乘船从日本平户津出发,经十多天就到达了南宋的明州。先到明州景德律院听善月律师讲戒律,又到天童山参曹源道生的弟子痴绝道冲。痴绝道冲,四川武信人,得法于曹源道生后,历任将山、雪峰、天童、育王、灵隐、径山等名山大刹的住持。圆尔辨圆入宋参访的时候,他正好住持天童山景德禅寺,弘扬禅法。参访痴绝道冲后,圆尔辨圆又到杭州天竺从天台耆宿柏庭善月(1149—1241)学天台教法,柏庭善月将自撰《首楞严经疏》、《楞伽经疏》、《圆觉经疏》、《金刚经义疏》四经疏钞及天台宗宗派相承之图授与圆尔辨圆,但圆尔辨圆并未在他身边久留,而是又赴南屏山净慈寺参访笑翁妙堪(1177—1248,为大慧宗杲弟子)、灵隐寺石田法薰(1171—1254,为破庵弟子),往来于此二寺之间^[31]。圆尔辨圆在灵隐寺的时候正逢无准师范的弟子退耕德宁在此寺任知客,他见圆尔辨圆志向不凡而对他说道:“攀下诸名宿,子已参遍,然天下第一等宗师唯无准师范耳,子何不承顾盼乎?”^[32]圆尔辨圆即赴径山参访无准师范,并最终获其印证,成为第一个师承径山的日僧。

2、无准师范与圆尔辨圆

无准师范,名师范,号无准,俗姓雍氏,四川梓潼(绵州梓潼县治)人。无准师范是南宋时期佛教界泰斗,临济杨岐派中心人物,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他对临济杨岐派在南宋的兴盛以及日本禅宗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被日本临济宗相国寺派管长称为是:“日本禅宗史上不可忘却的人物。”^[33]他的嗣法弟子有雪岩祖钦(?—1287)、高峰原妙(1238—1295)、弘法天目山而名闻一世的中峰明本(1263—1323),以及千岩元长、大拙祖能、万峰琦禅师(1592—1673)。另外前往日本弘法的无学祖元和兀庵普宁(1197—1276)也都是无准师范的高足,他们到日

本分别创立了佛光派和宗觉派。事实上,有“古来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中三分之一为无准的法孙”^[34]之说,无准师范门下日本的禅系最为繁荣。除了佛光派和宗觉派,还有圆尔辩圆的圣一派,乃至赴日的灵山道隐嗣法无准师范门下的雪岩祖钦,其法系称为佛慧派,大休派开山正念、无象派开山静照嗣法于无准师范门下石溪心月,大应派开山南浦绍明从无准师范门下虚堂智愚(1185—1269)受法。所以无准师范门下繁花似锦,其法系在整个日本禅系中最为繁茂、影响也最大。但其中首推还要属于圆尔辩圆对日本佛教影响与贡献最大。

圆尔辩圆在退耕德宁的建议下,遂赴径山拜访无准师范,无准师范一见即获器许,随侍左右。《径一国师年谱》中说:“尝在径山主掌衣钵,佛鉴不呼侍者,但称尔老。”^[35]但一日,为了启发圆尔辩圆悟明心性,无准师范用了最辛辣的手段锤炼圆尔辩圆,因此无准师范与圆尔辩圆师徒之间曾发生了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这就是“首山竹箠”这则公案^[36]。一天无准师范向圆尔辩圆提出了“首山竹箠”这则公案,此公案曾是首山省念禅师(926—993)在某日向修行僧提出的问题,内容是“首山和尚”,拈竹箠示众云:“汝等诸人,若唤作竹箠则触,不唤作竹箠则背,汝诸人且道,唤做什么。”^[37]

竹箠是禅僧用于举扬佛法时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做是个小尺寸的戒尺,禅僧都可纵横自如地操纵使用。首山以这个竹箠为题质问修行僧,其为何物?如果说叫作竹箠,就是拘泥了竹箠这一固定观念;如果说它只是根用竹子做的小棒,暂且称为竹箠,那还不是竹箠。那样说的话,不免又生出疑问。这里叫作竹箠的东西不是实实在在的吗?张口陈述不成,闭口无言也不成,那么到底应当把它叫做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难题。

为了悟得这则公案,圆尔辩圆日日夜夜、深究苦参,怎么也悟不出个道理来。这是因为圆尔辩圆长于天台教学和密教,对释迦佛祖的言教总是非常执著,而被其束缚住了。无准师范之所以敢于把有着这样出身、经历的圆尔辩圆纳入门来严加接引、教导,是因为他对这个异国青年禅僧抱有很大的期望。

某日,圆尔辩圆照例如此这般地向师父陈述自己对此问题的见解。无准师范终于手持竹箠发狠把圆尔辩圆痛打一顿,直到打倒在地。圆尔辩圆在被打得气息奄奄之时,终于豁然大悟。他摆脱了“有无”二字,彻底契悟而达到圆融自如的佳境。圆尔辩圆立即焚香感谢师父大恩。无准师范对圆尔辩圆的彻悟大为高兴,随即给圆尔辩圆写了认可书,表示祝贺。《年谱》中说:“汝学海浩渺,此来我竹箠下,一时干枯,佗日归本国,必于无涓滴处,横起波澜,竖无胜幢,发挥吾道,须踵从上乃祖遗芳,永利未来际。”^[38]又曰:“圆尔上人,效善财游历百城,参寻知识,决明己躬大事,其志不浅。”^[39]

圆尔辩圆得到认可后,继续在无准师范门下参禅修行了三年。一日,佛鉴召圻方庵和圆尔辩圆。烧香闻讯而告之曰:“今夜广泽龙王(径山土地)告汝等二人,化导时至,龙王必不食言矣。圻,汝近日有专使,不得拒辞。尔,汝早归本土,提倡祖道。”^[40]

佛鉴希望他早日回国,“一一依从上佛祖法式”^[41],“更宜以此道力行,使吾祖之教,在在处处,炽然而兴”^[42]即回国后按临济宗的宗旨仪规弘布禅法、开示众生。

南宋淳祐二年(1241)圆尔辩圆辞别无准师范,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临行前,无准师范将密庵咸杰祖师(1118—1186)的法衣、宗派图 and 自赞顶相以及《大明录》等,作为传法的信物,付与圆尔辩圆。同门诸友也都作颂相送,以缅怀和鼓励这位异国的僧人^[43]。圆尔辩圆回国后,与无准师范常有书信往来。在听说径山遭火灾的消息后,圆尔辩圆立即劝华裔商人谢国明化千板木材给无准师范作为径山修缮之资^[44]。圆尔辩圆圆寂后还立下遗言,东福寺从不准纪念他的诞辰,后世只许纪念他中国老师无准师范禅师的诞辰。寺中始终恪守圆尔辩圆之命,于今历800年而不违,可见师徒情谊之深厚。

三、圆尔辩圆归国后的活跃

圆尔辩圆辞别无准师范后,于南宋淳祐二年(1241)秋于九州博多(今福冈)登陆,太宰府僧湛慧^[45],与圆尔辩圆是同门师兄,和圆尔辩圆一起入宋求法,嗣法于无准师范,但他比圆尔辩圆早回日本,于横岳

山建一寺庙,闻圆尔辩圆回国,请他开山说法,并以无准师范所嘱“崇福寺”为寺号^[46]。肥前(今长崎佐贺一带)僧荣尊^[47],也与圆尔辩圆同时入宋求法,三年后回国创水上教院,闻圆尔辩圆回国也请之为开山祖,并将寺院改为禅寺,名万寿寺^[48]。宋移民谢国明在博多创承天寺,也请圆尔辩圆住持^[49]。无准师范闻之,亲笔书赠承天寺的寺额以及诸堂的大小堂额^[50]。承天寺与崇福寺规模都很大,圆尔辩圆在这两座寺院举扬禅法名声很大,遂遭到当地智山寺僧徒的嫉妒,要破坏承天寺,朝廷得知后,不但不允许,还赐升承天、崇福二寺为官寺^[51]。并于宽元元年(1243)正月下敕“西都法窟”匾额^[52]。由此,使九州一带对禅宗刮目相看,皈依新兴的禅宗者络绎不绝,圆尔辩圆此时声振博多。

当时朝廷的摄政九条道家、良实父子尊崇佛教,他们闻圆尔辩圆之名,召入宫中,终日问道,并从圆尔辩圆受禅门大戒并密宗灌顶。九条道家又为圆尔辩圆在京都东山月轮的别庄,模仿宋朝的径山寺,建立规模等同于东大、兴福二寺的东福寺,正所谓“洪基亚东大,盛业取兴福”,故将新寺命名为“东福寺”^[53],迎请圆尔辩圆及其弟子一同入寺弘扬禅法,这就为禅宗大举进入京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圆尔辩圆以东福寺为中心进一步弘扬临济禅法,东福寺因此而成为日本临济宗的大本营。前来参学问道的人越来越多。圆尔辩圆在京都受到藤原氏以及道家为首的贵族的尊崇,其子关白良实、妻准后、女婿兼经、西园寺实氏对圆尔辩圆皆执弟子礼。乃至藤家、良家以下的文武百官也礼敬圆尔辩圆^[54]。九条道家还模仿唐代宗赐径山开山祖师法钦禅师“国师”之号,亲书“圣一和尚”^[55]四字赠给圆尔辩圆,可见其当时的威望。

圆尔辩圆还曾三度前往镰仓弘通佛法,使得当时日本的实际执政者北条氏(1227—1263)也笃信禅宗。北条时赖把圆尔辩圆请到府中请问禅宗奥义,并依之受禅门菩萨戒。圆尔辩圆应时赖之请任镰仓寿福寺的住持以及京都建仁寺的住持^[56]。当时建仁寺刚遭火灾,圆尔辩圆主持修复佛殿、僧堂等。

圆尔辩圆不仅是禅林的杰出领袖,还受到当时整个佛教界的景仰崇拜。曾被迎请兼任天王寺的要职,

文永八年还被敕任为东大寺大劝进,又任尊胜寺、法成寺干事等职^[57],主持修复这些寺院的佛像、殿堂等工程,成绩斐然。

此外,圆尔辩圆的名声不断传入朝廷宫中。宽元三年(1245)为后嵯峨天皇(1220—1272)进讲了《宗镜录》,正嘉元年(1257)又为之授戒^[58]。并且还曾为后深草天皇(1243—1304)、龟山天皇(?—1424)授菩萨戒^[59],深受朝廷皈依。

圆尔辩圆的学德也遍及日本列岛,当时日本各个宗派的僧俗也都慕名前来问法。比睿山延历寺座主慈源常向圆尔辩圆问“显密奥秘”^[60];天台宗僧静明来问天台宗义,“兼探别传之旨”^[61]。此外,律宗泉涌寺慧晓,慕师道而至,请问修行心要^[62];东大寺戒坛院圆照前来受禅戒^[63];法相宗良遍在请教圆尔辩圆后,写出《真心要诀》^[64];三论宗的回心也登门问“二谛”之义^[65]。圆尔辩圆通过与这些佛教界的高僧接触,更进一步扩大了临济宗的影响。另外,崛河大相国源基还向圆尔辩圆请问三教大旨,圆尔辩圆述《教要略》呈之^[66]。当时著名的儒学之士菅谏议为长闻师之名,心中不服,想与圆尔辩圆一绝高下,也前来参请,最后不战而败,“钳口而退”^[67]。

圆尔辩圆当时之名声如日中天,上至朝野当权者、公卿贵族,下至广大僧俗市民莫不拥护和信赖,纷纷皈依其门下。其名还远播海外,以致于文历初,甚至高丽国王“听尔道誉”,也“附贡舡贲书币求法语”^[68]。难怪乎西畠子润(1249—1306)在写给圆尔辩圆的信中称赞道:“每惟和尚,道德贯充,权衡八表,天上人间,咸沾利益。末世大法桥梁,舍和尚而谁耶?钻仰有所不及。子畠自惜不获久依座下,以睹光明盛事,为不满耳!”^[69]

四、圆尔辩圆对日本禅宗的贡献与影响

圆尔辩圆从南宋求法归来后,对日本佛教禅宗的传播与弘扬,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与影响,因此他在日本佛教史、日本禅宗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1、传来临济杨岐派禅法。

圆尔辩圆以东福寺为中心,首先将临济宗杨岐派

传入日本加以倡导，成为日本临济宗杨岐派的始祖，继荣西之后，促进了临济宗在日本的确立。客观地说，荣西固有开启之功，圆尔辩圆乃是奠基之祖。

关于临济宗杨岐派在承安元年（1171—1174），曾有日僧觉阿（1143—1182）到宋朝从佛海慧远禅师学习禅宗的杨岐派禅法，四年后回国，第一次将临济杨岐派禅法传入日本^[70]。但由于没有设立门庭加以传授，也没有传承，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都影响甚微。而圆尔辩圆承得无准师范的衣钵回国，在崇福、承天、东福寺等道场首次倡导临济宗杨岐派的禅法。正如其师兄径山僧道樗所赠诗曰：“兴尽心空转海东，定应赤手展家风。报言日本真天子，且喜杨岐正脉通。”^[71]可见临济宗杨岐派此时才第一次由圆尔辩圆从无准师范处传入日本，圆尔辩圆因此成为日本临济宗杨岐派的始祖。

由相关圆尔辩圆的资料可知，圆尔辩圆回国后弘扬禅法，虽也受到旧佛教势力的干扰，但波及不大^[72]，而且其弘扬禅法的范围及影响也非常的深广。圆尔辩圆弘扬禅法的中心东福寺虽然也兼容台、密，但他凭借九条道家等朝廷显贵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更重要的是依靠当时日本朝野对宋代崭新佛教文化的仰慕，以及对临济正宗禅的日益理解和倾倒而大举禅风，逐渐打消了天皇及九条道家对临济禅的疑惑，获得了朝野上下广泛的支持和皈依。这为临济禅打进、根植京城取得了成功。在圆尔辩圆及其门下众多弟子的竭力举扬下，使临济宗走向了兴盛，迎来了禅宗兴隆的第一时期，正如《剡峰殊禅师行道记》中所述：“日本禅宗之学，自圣一国师唱无准师范之道于东福，可谓中兴矣。”^[73]虎关师练《元亨释书》卷七则说：“建久之间，西公（荣西）导黄龙之一派，只滥觞而已，建长之中，隆师（兰溪道隆）谕唱东壤（关东），尚薄于帝乡。慧日（圆尔辩圆）道协君相，化洽畿疆，御外侮而立正宗，整教纲而提禅纲，盖得祖道之时者乎！”^[74]

这些都说明了日本禅宗的昌盛，始于圆尔辩圆，正所谓“日本禅门之繁昌，由此而始”^[75]也。圆尔辩圆以京都东福寺为中心，并远及九州的崇福寺、承天寺、万寿寺和镰仓的寿福寺等，扩大了禅宗在京都及九州等

地的影响，促进了临济宗在日本的确立，所以说圆尔辩圆乃是奠基之祖。

从禅法上来说，圆尔辩圆的兼修禅实际上有超越荣西的。从现存资料看，由于旧佛教的势力所迫，圆尔辩圆虽仍没摆脱兼修禅的模式，但他已把重点放到了传播临济正宗禅的方面，在他住持的寺院内开始按宋地禅院的仪规程序说法、行事。他自己也曾表示：“以坐禅功夫为本分行履，味法喜禅味，为圣胎长养，透佛祖不传之妙，绍径山先师之宗。”^[76]所以圆尔辩圆的禅风已渐脱离天台、真言二教，逐渐向以纯粹的宋朝无准师范禅风为基础的方向发展，并且日臻成熟、巩固，这又为“纯粹禅”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传来了中国的禅林制度

中国禅林的清规，最早有唐代百丈怀海（720—814）所撰述之《百丈古清规》。但到北宋时代古清规已散逸，禅林规则紊乱，而且《百丈古清规》中有很多制度已无法适应日渐庞大的丛林组织的要求，正如宗赜在《禅苑清规》序文中说：“少林消息已是剝肉成疮，百丈规绳可谓新条特地。而况丛林蔓延，转见不堪。加之法令滋彰，事更多矣。”^[77]所以宗赜在《百丈古清规》的基础上，又从当时禅宗寺院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于宋崇宁二年（1103）编撰《禅苑清规》。其后，此清规便成为宋元期间最为流行且通行于全国禅宗丛林的清规。

作为五山之首的无准师范所住持的径山寺，乃是当时中国最有代表的禅宗道场，其修行生活自然是依照当时中国禅林的中心规范《禅苑清规》，无准师范也非常重视推行宋地的丛林规范。圆尔辩圆在宋六年，深得无准师范的教导。回国后，自然会遵循其师的嘱托，将宋朝禅林规矩、僧堂生活移植到日本。弘安三年（1280），圆尔辩圆就以《禅苑清规》为蓝本，制订了《东福寺清规》。^[78]

在《日本古文书》家わけ第二十 东福寺文书之一 中有 圆尔东福寺规式，于中说圆尔辩圆“以佛鉴禅师丛林规式，一期遵行之，永不退转矣”^[79]。圆尔辩圆在东福寺推行宋地的禅院制度，并依照《禅苑清规》设立寺院的职事制度、法事活动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

如在 慧日山东福禅寺耆旧籍 一条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当时东福寺设立了副寺、维那、典座、直岁、首座、藏主、知客、浴司、侍者等僧职^[80]；在 东福寺维那寮日中行事须知簿 一条中则可以看到东福寺的法事活动制度，“一日，祝圣诵经、上堂、罗汉供、寮主进退；二日，土地堂诵经……”^[81]；而在《径一和尚语录》以及《大日本古文书》家わけ第二十一 东福寺文书之二 等书中，则可以看到当时圆尔辩圆以东福寺为主所建立的禅林教育制度。

除了东福寺，圆尔辩圆在曾所住持过的镰仓寿福寺、博多承天寺、万寿寺等寺院也制定了清规。如《径一玉涉》一书中说：“圆尔在宋地《禅苑清规》的基础上，五十三岁的时候，在镰仓寿福寺制定了清规，对当时修行僧人的寝食起居、僧团的生活都作了规定。另外，也制定了承天寺、崇福寺、万寿寺的寺规。”^[82]

总之，圆尔辩圆将中国的禅林制度传播到了日本，这不仅为禅宗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也促使日本禅宗向宋地禅林寺院的方向快速发展，并日趋完善与规范。在圆尔之后，清拙正澄（1274—1339，大鉴禅师）为日本禅林制定了《大鉴清规》^[83]，此规正是在圆尔所传回来的原《禅苑清规》基础上的完善，遂成为后世日本禅林的规范，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禅林。

【注 释】

[1] 加藤みち子《圆尔禅の再检讨——“禅”と“佛心宗”概念の分析を通し》，《日本思想史》第六十八号，日本思想史恳话会編集，2006年4月，第49页。

[2]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 遣唐使，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62页。

[3] 西村天因《日本宋学史》大阪：杉本梁江堂1909年9月版，第23—24页。

[4] 参照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 名留史册的入宋僧，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255—258页。

[5] 参照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 来日宋朝僧人一览表，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369—

370页。

[6] 同上，第306—334页。

[7]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 名留史册的入宋僧，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305页。

[8] 铃木大拙《禅与儒教在日本》，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1册之 中日佛教关系史研究，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359页。

[9]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佛书刊行会1912年7月版，第131页下。

[10]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 名留史册的入宋僧，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336页。

[11] 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五十八 京兆泉涌寺沙门俊苾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3册，佛书刊行会1979年8月版，第281页上。

[12] 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五十八 京兆戒光寺沙门净业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3册，佛书刊行会1979年8月版，第284—285页。

[13] 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 名留史册的入宋僧，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336页。

[14] 铃木大拙《禅与儒教在日本》，张曼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1册之 中日佛教关系史研究，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358页。

[15]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16页。

[16] 铃木大拙《禅与儒教在日本》，张曼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1册之 中日佛教关系史研究，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359页。

[17] 《续群书类丛》第九辑上 传部 卷二百二十六《种子禅师荣尊大和尚年谱》，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58年6月版，第298页下。

[18]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五 城内外寺院，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285页。

[19] 宋·宋濂《宋文宪公护法录》卷二 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1666年刊本，第3107页。

[20] 以上五山十刹，参见玉村竹二校订《扶桑五山记》卷一 大宋国诸寺位次，京都：临川书店1983年5月版，第3—21页。

[21] 教院之五山十刹,参见宋濂《宋学士集》卷第二十五 翰苑续集 卷五之 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缩本,第8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6月版,第213—214页下。

[22] 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五十八 京兆泉涌寺沙门俊苾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3册,佛书刊行会1979年8月版,第282页下。

[23] 师蛮《本朝高僧传》卷五十八 京兆泉涌寺沙门湛海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3册,佛书刊行会1979年8月版,第286页上。

[24] 参照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入宋僧履历的地方,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340页。

[25] 参照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南宋时代入宋僧一览表,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第306—334页。

[26] 同上,第306—334页。

[27] 一真编《佛光国师语录》卷六,《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四十八 禅宗部,铃木学术财团1971年8月版,第111页下。

[28] 参照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之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第389—393页,及入明僧一览表,第588—60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版。

[29]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佛书刊行会1912年7月版,第131页上。

[30] 同上,第130页下。

[31] 同上,第132页上。

[32]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财团1972年1月版,第102页下。

[33] 有马赖底著、刘建译《禅僧的生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2页。

[34] 转引自俞清源编著《径山史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页。

[35]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佛书刊行会1912年7月版,第129页上。

[36] 有马赖底著、刘建译《禅僧的生涯》,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2页。

[37] 宋普济撰《五灯会元》卷十一 首山念禅师法嗣之汝州县广教院归省禅师传,《续藏经》第13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6年12月版,第415页下。

[38]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财团1972年1月版,第102页下—103页上。

[39]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佛书刊行会1912年7月版,第133页上。

[40] 同上,第133页下。

[41]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财团1972年1月版,第103页下。

[42]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佛书刊行会1912年7月版,第135页下。

[43] 同上,第134页上。

[44] 同上,第135页上。

[45] 师蛮《本朝高僧传》卷六十五 筑前崇福寺沙门湛慧传,《大日本佛教全书》第103册,佛书刊行会1979年8月版,第349页上。

[46]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财团1972年1月版,第103页下。

[47] 《续群书类丛》第九辑上 传部 卷二百二十六《神子禅师行实》,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58年版6月版,第293页上一下。

[48]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95册,佛书刊行会1912年7月版,第134页下。

[49] 同上,第135页上。

[50] 同上,第135页上。

[51]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财团1972年1月版,第104页上。

[52] 有马赖底著、刘建译《禅僧的生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3页。

[53]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

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才团 1972 年 1 月版，第 104 页上。

[54]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95 册，佛书刊行会 1912 年 7 月版，第 136 页上。

[55] 同上，第 136 页上。

[56] 同上，第 140 页下。

[57]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才团 1972 年 1 月版第 104 页中。

[58][59]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95 册，佛书刊行会 1912 年 7 月版，第 143 页上—143 页下。

[60][61]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才团 1972 年 1 月版，第 103 页中。

[62]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95 册，佛书刊行会 1912 年 7 月版，第 141 页上。

[63][64][65] 同上，第 138 页上。

[66] 同上，第 142 页上。

[67]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才团 1972 年 1 月版，第 103 页中。

[68] 同上，第 104 页下。

[69]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95 册，佛书刊行会 1912 年 7 月版，第 143 页下—144 页上。

[70]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六 觉阿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才团 1972 年 1 月版，第 98 页下—99 页上。

[71] 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95 册，佛书刊行会 1912 年 7 月版，第 134 页上。

[72] 据铁牛圆心编、岐阳方秀校正《东福开山圣一和尚年谱》载，圆尔在肥前和静冈一带弘禅时，有宰府智山寺僧，嫉妒圆尔弘禅，欲告于朝廷，要破坏承天寺，朝廷得知后，不但不允许，还赐升承天、崇福二寺为官寺。见《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95 册，佛书刊行会 1912 年 7 月版，第 135 页下。

[73] 《续群书类丛》第九辑下 传部 卷二百三十九 剗峰殊禅师行道记》，东京：续群书类丛完成会 1957 年 5 月版，第 674 页上。

[74] 虎关师炼《元亨释书》卷七 圆尔传，〈大日本佛教全书〉卷六十二 史传部，铃木学术才团 1972 年 1 月版，第 104 页下。

[75] 无住一圆《沙石集》卷九，渡边纲也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85，东京：岩波书店 1966 年 5 月版，第 395 页。

[76] 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大日本古文书》家わけ第二十 东福寺文书之一 之 圆尔普门院四至榜示置文，东京大学 1956 年 3 月版，第 69 页。

[77] 宋·宗赜《禅苑清规序》，《续藏经》第 111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76 年 12 月版，第 875 页上。

[78][79] 参见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大日本古文书》家わけ第二十 东福寺文书之一 之 圆尔东福寺规式，东京大学 1956 年 3 月版，第 83 页。

[80] 参见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大日本古文书》家わけ第二十 东福寺文书之一 之 慧日山东福禅寺耆旧籍，东京大学 1956 年 3 月版第 301—330 页。所谓副寺又称为监院，职责是统理寺院大小事务，凡寺院内一切活动均要负责。维那，主要任务是监督纪律，对寺中所发生的纷争予以调解与处理，维持寺院纪刚。典座，主管大众的饮食。直岁，负责寺院的维修工作。首座，是寺院的表率，大众的榜样，负责举正不如法的事，包括提醒寺院住持应做之事。藏主，掌管藏经佛典，相当于现在图书馆的馆长之职。知客，负责寺中接待宾客。浴司，负责浴室厕所的清洁。侍者，主要任务是照顾住持和尚的生活起居，也可替住持捎口信等。以上这些职事，事实上也都是宗赜《禅苑清规》中所设立的僧职，见宗赜《禅苑清规》卷三、卷四及卷五之僧职的设立。《续藏经》第 111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76 年 12 月版，第 890—902 页上。

[81] 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大日本古文书》家わけ第二十 东福寺文书之一 之 东福寺维那寮月中行事须知簿，东京大学 1956 年 3 月版，第 233 页。

[82] 吉野孝利主编《怪一玉涉》，圣一国师生诞 800 年纪念事业实行委员会 2002 年 11 月版，第 113 页。

[83] 《钦鉴清规》现收于《钦正藏》卷八十一。又称《钦鉴小清规》，是清拙正澄东渡日本(1326)后，为适应日本禅林而作。